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必须着力回答的重要问题^{*}

张国祚

【内容提要】“第二个结合”是对应“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必须突破以往认识的局限，深入思考四个重要问题：第一，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秀”？第二，如何看待“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第三，如何看待“第二个结合”的可行性？第四，如何看待“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的关系？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 “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张国祚（1948—），湖南大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教授（湖南长沙 41008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第二个结合”是对应“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必须突破以往认识的局限，深入思考以下四个重要问题。

一、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秀”？

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可以传承的文化基因，也有只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史料。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秀”是需要论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秀”。一是高度评价其思想和精神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②，“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③。二是高度评价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原创性贡献研究”（23&ZD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3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4页。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②三是强调其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元素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四是强调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巨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③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深刻回答了其何以优秀的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还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上。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④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主要是指哲学思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对立统一辩证思维，格物致知思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思维，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中庸思维等，为科技发展营造包容创新的社会氛围、创造活跃的文化环境，使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在此后1000多年领先于世界。正如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⑤。但是，李约瑟在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技水平之后提出一个困惑：“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⑥我们知道，鸦片战争正处于李约瑟所说的“近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时期。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因西方列强的肆意侵略、掠夺、瓜分、践踏、凌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昔日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陷入此种困境？这可以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窥见一斑。鸦片战争的失败，从直接原因看，是清军武器的落后；从文化根源看，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落后。面对文艺复兴后思想解放、科技发展、生产力飞跃的西方列强携带坚船利炮的进攻，思想文化封闭保守的国家难免不堪一击。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不再“优秀”？并非如此。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败，而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及其文化糟粕的失败，其中以“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为最。“三纲”最早的释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宋代真德秀的注释是：“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大学衍义·卷六》）此时的“纲”有示范、引领、导正之意。到了元朝，吴澄把“纲”解释为“天”：“为之纲者，为之天也”（《吴文正集·卷四十二》）。到了晚清，曾国藩把“纲”解释为绝对服从：“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⑦在这样的“三纲”的威慑下，文臣武将的创新思维必然因畏于君权而难以发挥，整个社会的男人的创新思维必然因畏于父权而受到压抑，整个社会的女人的创新思维必然因畏于夫权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春秋战国时期鼓励和包容创新的优秀思想文化逐渐被边缘化，而“三纲”政治文化逐渐居统治地位，导致整个国家的思想越来越封闭、保守，越来越压抑创新的勇气，科技越来越落后。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8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5页。

⑤ 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⑥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⑦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936页。

对比中国古代科技领先光耀世界和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备受欺凌，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兴，则国运强；“优秀”隐，则国运衰。这种“优秀”不仅能以民族精神、思想理念和语言风格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形态，使其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而且可以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富有永恒魅力。因此，我们要充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优，使之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开辟、理论创立、制度设计提供开源性的影响和创新性的启发。

二、如何看待“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

从广义上看，“中国具体实际”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当然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涵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涵盖“第二个结合”。既然如此，如何看待“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文化、实践三个维度进行解析。

从理论创新的生成逻辑来看，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包含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两大决定性因素——根脉和魂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①。二是因为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能否被人们所接受、所认同，关键看这种理论能否深入人心，能否与人们的情感、理念、价值观、知识域相契合。鉴于情感、理念、价值观和知识域都由民族历史传统文化逐渐涵养而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所认同，关键看其能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②。这段话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力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人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种“必要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再得到证明。例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③。司马迁认为，自己因替叛将李陵辩护而死，比鸿毛还轻；如能忍受耻辱、继承父亲遗志完成《史记》后再死，就比泰山还重。毛泽东赋予司马迁的话以全新的含义，把对“泰山”的尊崇留给热爱人民、报效人民的人，把对“鸿毛”的轻蔑留给人民的敌人，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死观。又如，“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实事求是”原本是班固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赞赏，夸奖他重视学习古典文献，且能根据事实考证文本的出处和真伪。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④，并把“实事求是”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再如，毛泽东借用愚公移山的故事阐述唯物史观，生动形象地揭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他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

①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① 还如，毛泽东用《封神榜》中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样法宝”——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比喻我们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②，生动精辟地阐发了“三大法宝”的威力，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上面四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变得生动活泼，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从文化守正创新的逻辑来看，推进“第二个结合”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受到封建社会制度的制约，难免存在不科学、不健康或腐朽没落的文化糟粕。为了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样才能提炼和遴选出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这个梳理、鉴别、提炼和遴选的过程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的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最根本的在于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优秀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代表人民利益，符合历史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从立场、观点、方法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科学指导。事实上，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跟上时代步伐，焕发时代生机，作出时代贡献，变成引领时代潮流的现代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④。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来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积极推进“第二个结合”。一方面，道路的开辟及人民对道路的认同，理论的创立及人民对理论的领悟，制度的设计及人民对制度的理解，都和历史文化修养密切相关。毛泽东早在 1938 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⑤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毛泽东所说的“不应当割断历史”密切相关，毛泽东所说的“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⑥ 具有重大的当代启示，这意味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助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⑦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⑧ 另一方面，哪里有实践的涌动和活跃，哪里就有文化的创造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102 页。

② 参见海鲁德等编著：《生活中的毛泽东》，北京：华龄出版社，1989 年，第 66 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76 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6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33—534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34 页。

⑦ 《“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19 日。

⑧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5 页。

国式现代化则能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力量。透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我们可以进一步领略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伟力和魅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①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实践，而“第二个结合”可以让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为这一伟大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的创新。

纵观“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可以作如下概括：“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之必须；非此，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理论；非此，不能使历史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成富有生机活力的现代文化；非此，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映生辉，不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②。

三、如何看待“第二个结合”的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者产生于东方封建主义社会；前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者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理政所遵循。存在这样巨大差异的两大思想体系能够结合吗？鉴于此，对“第二个结合”的可行性必须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③ 这为我们研究“第二个结合”的可行性指明了方向，即必须着眼于两者的“相互契合”。

两种思想体系的相互契合，并非指两者完全一样，而是指两者的立场、观点、主张、思维方法等存在相互照应、相互融洽、相互吻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④ 只要认真挖掘、梳理和提炼，就不难发现，两者“相融通”的地方确实很多。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个“重要元素”，都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某种契合之处。一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的社会理想，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相互关爱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契合的。二是“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这一治理思想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依靠，执政者对老百姓要以德善待之，要关心爱护。这样的治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的观点也是非常契合的。三是“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9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78页。

这一传统的意思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风俗相互融合，这和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等“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是契合的。四是“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实现共产主义不能一蹴而就，只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解放了，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也是契合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①。五是“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如果早晨明白了一个值得信奉的真理，即便晚上就为它而死也心甘情愿。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信奉者都是“明”共产主义之“德”、“弘”马克思主义之“道”的忠贞践行者。方志敏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②夏明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都是因明德弘道而视死如归的典范。六是“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马克思主义的使命说到底，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富民厚生的好日子；在发展经济时，则要“义”字当先、义利兼顾。可见，“富民厚生、义利兼顾”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相契合的。七是“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反对人类的发展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③，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与恩格斯的观点契合的内容。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意思是，天地自然是万事万物的父母，万物同根同源，天地和我们共同生存，万事万物和我们浑然一体，我们不要相互伤害。可见，在生态理念上，庄子和恩格斯的观点是高度契合的。八是“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九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这两个“重要元素”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是契合的。十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里所说的“道”是道德的道，是讲诚信、求和睦、行仁义、善处邻的道德观。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依据生产关系来分析判断道德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⑤。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契合的。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个“重要元素”涉及马克思主义许多重要领域。如果进一步挖掘、梳理、提炼，肯定还会发现两者更多的契合之处。既然两者有如此众多的契合之处，足以说明“第二个结合”完全具有可行性。

四、如何看待“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的关系？

为了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两个结合”，我们应该从理论内涵、理论发展、实践需求和时代呼唤等四个维度深入剖析“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的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② 《方志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一是从理论内涵看，“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相互渗透、辩证统一。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具体实际”是文化底蕴不深的中国具体实际，不能服务“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难称优秀。因此，“两个结合”必须相辅相成，才能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①。之所以被称为“必由之路”和“规律性认识”，是因为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凝固化的马克思主义、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左”的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引领中国走向富强；只有坚持以符合中国具体实际、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使“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②。这就是说，“两个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引领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二法门”。

二是从理论发展看，“第二个结合”是从“第一个结合”中演化和提炼出来的，两者是被蕴含和蕴含的关系，是“流”和“源”的关系。“第一个结合”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做法。为了纠正这种错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③这是我们党对“第一个结合”最早的理论表述。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具体化”。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④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⑤的要求。在1941年5月19日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完整地提出“第一个结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⑥可以说，没有“第一个结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无法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第一个结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蕴含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萌芽。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和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注意中华民族特色相联系。一是强调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没有历史知识……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⑦。二是强调要“学习我们的历史”。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⑧三是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学风和文风。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6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综上可知，“第一个结合”是源，“第二个结合”是流，“第二个结合”蕴含于“第一个结合”，两者的关系是清晰明确的。

三是从实践需求看，“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都是为了回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需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两个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换句话说，“两个结合”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中国实践是最贴近“中国具体实际”的。因此，无论怎样强调“第二个结合”，都丝毫不可忽视和偏离“第一个结合”，“第一个结合”永远是实践的第一需要。同时必须清楚，伴随实践的发展，“第二个结合”的创新价值日益凸显。在“第一个结合”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开始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这种融入比较零散而不够系统，相对随机而没有总体规划，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而不是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而不是侧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应用。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实践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越来越大，“第二个结合”的用武之地更加广阔，可以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拓展、理论创新、制度改革等。可见，面对新时代新实践新要求，“两个结合”更需要紧密协调、相映生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创新道路、提供理念智慧。

四是从时代呼唤看，“第二个结合”比“第一个结合”的作用更加凸显。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矛盾日益复杂，霸权主义更加露骨，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文明冲突连绵不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大全球倡议”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它们的落实越来越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作支撑。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智慧和启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文明互鉴、“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文化包容、“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有利于培育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彰显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博大情怀，有利于站在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些理念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的人民中间引发了广泛共鸣。因此，“第二个结合”将更加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极大丰富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将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
- [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

（编辑：刘曙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34 页。